千年回眸 古渠春秋

西夏修渠依法管水 元初治水更立闸堰

——宁夏引黄古灌区发展史(三)

辽宋夏金时期:西夏立国兴农重牧 疏浚古渠依法管水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占灵州后,党项等民族熟练掌握了农业生产基本要领,“引河水灌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坛受册,自称皇帝,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实行兴农重牧政策,下令修建了长达150千米的昊王渠。从现在宁夏平原的渠道走向来看,昊王渠的渠线是最高的。

据史料记载,西夏在宁夏平原上修建了许多灌溉工程,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使西夏与宋、辽割据抗衡189年之久。此外,西夏人用于修筑护岸或堵截决口的“卷埽”技术,技艺精湛,领先其时代,西夏在水利管理上也十分严格,在中央设置农田司,专管农田灌溉事宜。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部成文法典,开创了依法管水用水的先河。当时宁夏平原上有汉延、唐徕等干渠12条,支渠68条,灌溉面积达160万亩,“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成为西夏赖以生存的“膏腴之地”。

在今贺兰山东麓,尚有昊王渠遗迹,起自青铜峡峡谷出口处,经银川市,至石嘴山市境内,沿山挖渠长达300余里,后因战乱废弃。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宁夏巡抚王珣为绝虏寇、兴水利,对昊王渠进行修复,并更名为靖虏渠,但终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竣,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而没成功。今之西干渠西侧有昊王渠渠线遗迹与之平行,部分渠段借用故道。

宋代(西夏)时期,统治者对农业和水利事业尤为重视,中央机构设有专管农田水利事务的“农田司”,农耕用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组织对古渠进行疏浚修复,在兴州有汉延、唐徕等渠,在灵州有秦家、汉伯、艾山等渠,并颁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具体规定了水利建设维修管理办法,凡开渠垦荒者受法律保护,使这里成为“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岁无旱涝之虞”的富庶之地。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年至1169年)颁行。一共20卷,1463条,近20万字。其中第15卷里涉及水利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文有“春开渠事”“园地苗圃灌溉法”“冬草条椽供给”“渠水”和“地水杂罪”等5门40条之多,从开渠、放水、岁修、派式、用料到违章处罚等皆有法可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汉延渠”“唐徕渠”渠名目前最早见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元代时期:郭守敬因旧谋新、更立闸堰

据史料记载,宁夏引黄灌区自隋唐起,引黄灌区使得宁夏有了“塞北江南”之称。但到了蒙古汗国统治时期,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大量河流古渠、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的毁坏。此时的蒙古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民之农桑乃国之根本,并不重视农业发展,更加不重视西夏(今宁夏)地区河渠、水利的维护和治理,致使该地区的农田大量荒废无人耕种、土地贫瘠、渠道淤堵、堤坝崩塌、河水泛滥,此时的宁夏河套地区再也不是当年有着塞北江南称号的富饶之地了。

至元元年(1264年),张文谦以中书左丞的身份巡视西夏,全面负责西夏治水工作,时任副河渠使的郭守敬随其前往,视察水利。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勘察地势水情,走访百姓,绘制地图,并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方案(即在疏浚旧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在渠首建闸坝)。忽必烈审批后付诸实施。

郭守敬率领民工开挖、疏浚原有河道,修堤建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了长达400余里的唐徕渠和长达250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10余条、大小支渠68条,同时更立闸坝,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圆满完成了疏浚修复河渠的任务。

至元三年(1266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董文用与郭守敬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市)新修蜘蛛渠(今美利渠),灌溉中卫周边地区近3000亩农田,当地农业获得丰收,官府的税赋收入也随之增加。

在宁夏治水期间,为了探索黄河的航运,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又亲率人员,从中兴(今银川市)乘舟,“顺河而下,四星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自身实践证明从宁夏至东胜这段黄河水路是可以通航的正确主张。忽必烈采纳了郭守敬的意见,在从应里州至东胜沿黄河设立了10处水运驿站,航程850余公里(其中在宁夏的有应理州、沙州、灵州、中兴等水运驿站,航程在宁夏境内的有约400公里)。此后,宁夏黄河航运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郭守敬一生治理河渠沟堰几百所,尤其以修复宁夏引黄灌区和规划沟通京杭大运河最为人著称。公元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建设。为实现京杭运河贯通,他进行系统勘测、科学规划,先后主持建成会通河、通惠河,南自杭州、北至大都的元明清大运河至此基本成形。郭守敬还编撰有《推步》《立成》《授时历》等14种105卷天文历法著作。

(本报记者 **单 瑞** 整理)

打石沟遗址见证红军峡谷歼敌壮举

如今的打石沟地形航拍图。

中央红军长征打石沟战斗遗址位于彭阳县白阳镇双磨村打石沟(店洼水库东侧)。1935年10月8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从小岔沟出发,经古城、打石沟向白杨城(今彭阳县城)挺进期间,发生了打石沟战斗。2021年7月1日,彭阳县委史志研究室和彭阳县文物局立碑标识。

1935年10月5日至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宁夏。10月7日,红军翻越长征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后,于当日傍晚进入今彭阳县境内,宿营于阳洼、乃家河一带的村庄。毛泽东住在阳洼小岔沟张友仁家的窑洞里。24时,毛泽东签发翻越六盘山后第一份电报“彭、李、叶、邓: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间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卅五师部队。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进”。

按照军事部署,10月8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中央红军第一纵队从小岔沟、乃家河一带出发,沿茹河向白杨城挺进。

一纵队先头部队四大队(队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全军前锋。凌晨五六点,天刚蒙蒙亮,四大队最先行进至打石沟。红军侦察员发现敌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的一〇四旅二〇五团第一营和一〇三旅二〇六团第一营向红军方向走来,离我军只有三四里路。打石沟是庆阳、镇原通往固原的必经之地,地处茹河河谷,是茹河川白杨城至青石嘴间最狭窄的一段,宽不足千米,河滩占去大半,南岸地势陡峭,只有北岸有简易公路通行,是伏击的好地形。王开湘和杨成武登上南面山头观察敌情,发现川道上敌人哩哩啦啦拖着一条很长的队伍,于是决定利用两侧山头地利设伏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消灭敌人。他们命令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南岸高地,另一个步兵连占领北岸高地,等战斗打响后,从两边用火力压制敌人;又命令两个步兵连和侦察连先对敌人发动猛冲,首先冲垮它,然后再边打边撤诱敌深入。

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左右两边山上和川里枪声大作,冲杀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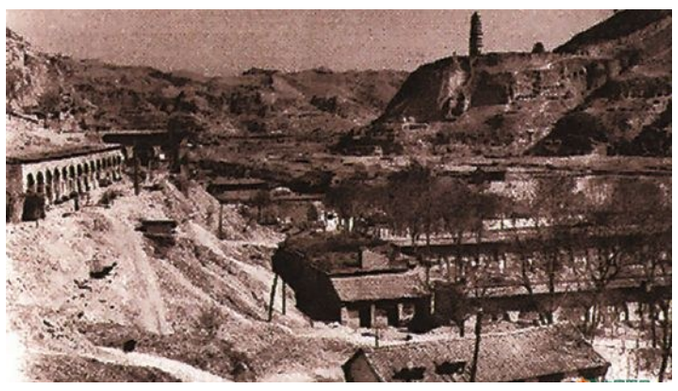
彻山谷,顺川道冲下去的红军战士像猛虎扑羊似的,势不可挡。在红军的突袭下,敌人乱作一团,丢弃辎重,拼命向北溃退。不到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敌人后面的队伍,听到这里枪声激烈,顺着来路一溜烟向庆阳方向逃之夭夭了。此战,红军击溃两营之敌,俘敌20余人,缴获枪支80余支及全部辎重。战士们觉得消耗了1000多发子弹,才俘虏了20多个敌军,缴获了他们的枪支,觉得有点不值得。

王开湘和杨成武还没来得及向纵队首长报告,一纵队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就从后面骑马赶上来,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似乎还不大相信。在查看了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后,他们才相信并高兴地笑起来,且下令四大队把俘虏和武器交给后面部队,继续向预定的目的地白杨城(今彭阳县城)前进。

这些俘虏很顽固,不服气打了败仗。红军原想通过教育把他们争取过来,但他们始终不配合。为尽快赶往陕北,过了白杨城进入镇原县境内,红军就把这些俘虏放了。在缴获的物资中,有步枪80余支,但多数是古董级的“十三太保”和“九响毛瑟”。这些东西红军得之无用,弃之又怕散兵拾去当山大王横行乡里,于是,战士们将所有缴获的枪支搬到河坝上,一支一支地用石头砸烂、掩埋。

(**据宁夏党史教育**)

陕甘宁兵工厂:黄土高坡铸锋芒



◀茶坊兵工厂老照片。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坐落着几孔土窑洞和石砌机房。抗战时期,这里曾是陕甘宁兵工厂的所在地。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兵工厂秉承“为前线服务、为战争服务、为边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它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组建了一支新型战斗集体,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百炼成钢,再建军工。1935年10月,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其中,原官田中央兵工厂108名兵工战士仅剩下7人,红四方面军归属到中央红军的70多名兵工战士,到陕北时也只剩下14人。这些经过战时生产和战斗考验的兵工战士,一边缅怀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一边同陕北兵工队伍会合,组建成新的兵工厂,为继续发展人民兵工事业投入新的战斗。

早期的兵工厂随军活动,流动性大,先后驻扎在延安柳树店、清涧、延川、吴起、延长等地,后迁回柳树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投入抗日作战,武器供应成为支撑抗日作战关键问题。10月22日,为加强抗日武装建设,毛泽东致电在抗日前线的周恩来和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一万支步枪,主要方法是自己制造。”

当时,恰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主人士涌向延安,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其中,以贺瑞林为首的近百名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以沈鸿为首的10名上海工人等,成为扩充红色兵工厂的生力军。尤其是沈鸿等带来的龙门刨、落地大车床、轻重车床等机器设备,使边区兵工厂的扩建如虎添翼。

服务作战,做大做强。1938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以下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兵工厂由延安柳树店迁至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也称茶坊兵工厂。初创时,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枪械修造部和机器制造部两部分,是一座既制造机器,又生产手榴弹、掷榴弹和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

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针,从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被分拆、整合,先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1939年5月,机器制造部改建为军工局一厂,主要负责制造子弹和手榴弹的专用设备,以及打浆机、火药机和前线便携的小磨床、小铣床、小钻床等机械设备。1939年4月,原枪械修造部迁往郝家岔,组建为军工局二厂,在修理枪械的同时,开始试制生产步枪。1939年5月,在茶坊原枪械修造部旧址建立军工局三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等,后来发展成为专造迫击炮弹的兵工厂。1942年,在茶坊又建成紫芳沟化学厂,主要承担硝酸、硫酸、硝化棉、双基药等发射药和黑火药生产任务。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建成了一个小规模、部分原料自给、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初步具备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能力。

奋发自强,打破封锁。陕甘宁边区位于三省边缘,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落后,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基本由外地供应。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边区军民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陕甘宁边区各兵工厂的工人想方设法,创造性地完成军工生产任务。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满足边区军民生产生活需要,军工局一厂在制造军工设备的同时,还大力制造民用机器,为边区经济提供成套设备。一厂先后自行设计、制造400台(件)民用机器设备,帮助边区建成火柴厂、肥皂厂、造纸厂、制药厂、皮革厂、纺纱厂、织布厂、印刷厂等,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奋斗过程中,陕甘宁兵工厂涌现出“边区工人一面旗帜”“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他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从原陕甘宁边区农具厂(1938年改制并入军工局一厂)工人干起,以厂为家、加班加点,自愿从事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在1939年至1941年间劳动竞赛中连续获得“甲等劳动英雄”奖章。他轻伤不下生产线,一心一意钻研技术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例如,他曾建议用大飞轮带动的鼓风机代替人力拉的大风箱,后来又改为用汽车发动机烧木炭来带动鼓风机,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大问题。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党、政领导和工会总结和宣传了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并掀起向赵占魁学习的群众运动。之后,在党中央的宣传与号召下,“赵占魁运动”又推广到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展成持续7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对敌作战,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实施战略大转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1947年3月开始,军工局一厂、紫芳沟化学厂、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等陕甘宁边区兵工厂,东渡黄河并入晋绥兵工部,继续为解放战争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

(**据《中国国防报》**)